

# 探討城市化浪潮對中國穆斯林 「遷移者」在信仰上的影響<sup>1</sup>

鄭曉春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 一、引言

中國與伊斯蘭教的關係源自該教創辦人穆罕默德，據傳他曾發出一條著名「聖訓」：「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海上與陸上的絲綢之路，把一批又一批的穆斯林帶到中國。<sup>2</sup>

千多年後，這些千里迢迢來到中國穆斯林的後代，現在枝葉繁茂，中國甚至有十個少數民族都信奉伊斯蘭教。估計如果按照 1990 至 2000

---

<sup>1</sup> 本文為 2005 年修讀梁家麟老師「本色化神學」的功課，感謝梁老師的指導及推薦發表。另 2006 年 12 月在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交流，簡述此文時，獲院長連珩教授指出當地一些穆斯林家庭頗重子女宗教教育，未受世俗化影響，在此一併致謝。筆者深知第一手田野調查資料之重要，盼望日後可擁如此機會。

<sup>2</sup> 「伊斯蘭」是阿拉伯音譯，本意為「順服」。信仰伊斯蘭教者為「穆斯林」，指「順服安拉的人」。秦惠彬：《伊斯蘭教知識讀本》（北京：宗教文化，2004），頁 1。

年的年遞增率發展，這十個少數民族人口將在二十一世紀中期，翻兩倍達到 40,641,160 人。<sup>3</sup>

穆斯林過的是信仰與生活極融為一體之聚居生活，然而面對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城市化洪流，穆斯林亦無法置身事外，主動或被動地重覆祖輩「遷移」的歷史，化身為——（一）城中人：因城市規劃而被迫在同一個城市中遷徙；（二）雙城人：帶著資本或知識，從一個城市走到更先進的城市；（三）城外入：或因生計從農村走進城市。

一般來說，遷移至新環境者較易改變其信仰，這是否同樣可以套在穆斯林身上呢？本文將聚焦上述三類「少數民族穆斯林」<sup>4</sup> 遷移者在信仰生活方面的改變，從而冀望對有心城市穆宣者有所裨益。

## 二、中國歷史中曾遷移的穆民

近代城市化無疑造成穆民的遷移，若回顧歷史，其實今人也是重覆先民當年的移民蹤印。相對前人翻山涉水地來到他邦異國，今天在一國之內的遷移距離雖然不遠，但影響比祖輩大得多。接下來看看穆民在中國遷移的歷史。

---

<sup>3</sup> 究竟中國有多少穆斯林？這與中國有多少基督徒一樣，無法拿出準確數字。根據二千年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十個少數民族共有 20,320,580 人。孟航：〈中國穆斯林人口分佈格局淺析〉，《西北民族研究》總第 43 期（2004 年第 4 期），頁 90。亦有數字指出中國另有一千多萬漢族穆斯林，參〈伊斯蘭在中國〉，《伊斯蘭，基督教，真理網》，〈[http://answering-islam.org.uk/Chinese/project/big5\\_index.htm](http://answering-islam.org.uk/Chinese/project/big5_index.htm)〉（2005 年 9 月 28 日下載）。根據《亞洲週刊》2002 年報導，上述十個民族總人口為 2,100 萬，但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統計則為 3,800 萬。〈中國伊斯蘭儒家身影〉，《亞洲週刊》（網上訂戶版）第 16 卷 51 期（2002 年 12 月 22 日）。

<sup>4</sup> 下統稱為穆斯林，不包括漢族穆斯林。

## （一）唐朝傳入中國

穆民何時傳入中國的說法不一。<sup>5</sup>一般來說為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阿拉伯）第三任哈里發<sup>6</sup>奧斯曼（Othman/ Usaman，644-655）的使者抵達長安，並謁見唐高宗李治，向這位剛登基一年的唐朝皇帝介紹阿拉伯的基本情況和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從此，兩國往來日漸頻繁。

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來華經商或旅遊者從此絡繹不絕。他們來華路線有二：陸上絲路，即自波斯經新疆沿絲綢之路，到達長安和洛陽等地；海上絲路，由波斯灣出發，繞馬來半島到達我國東南沿海各商城。<sup>7</sup>以廣州為例，我們可以看到唐宋時期穆斯林先民的商業活動以海上貿易為盛。政府不僅在海外貿易政策上給予優惠和便利，而且設置蕃坊供其聚族而居。<sup>8</sup>

## （二）元朝的興旺期

「元時回回遍天下」，一語道盡了元代穆斯林的興盛。他們主要是來自中亞和西亞的士兵、商人，其中既有幫助蒙元降服天下而權傾一時

---

<sup>5</sup>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起始年代共有五種說法，一為隋開皇中，二為唐武德，三為唐永徽二年，四為八世紀初，五為唐貞觀初。周燮藩、沙秋真：《伊斯蘭教在中國》（北京：華文，2002），頁36～40。不過，王俊榮及馮今源只認同首四種說法，另加五種說法：一為隋大業九年，二為唐景雲二年，三為唐明皇時，四及五則將周燮藩、沙秋真的唐貞觀初；一分為二，即貞觀二年及貞觀三年。王俊榮、馮今源：《伊斯蘭教學》（北京：當代世界，2000），頁315。引自孟航：〈中國穆斯林人口分佈格局淺析〉，頁85。

<sup>6</sup> 哈里發是穆罕默德逝世後，繼續執掌政教大權者的稱號。原意為代理者、繼任人。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陳廣元編：《新時期阿訇實用手冊》（北京：東方，2005），頁222。

<sup>7</sup> 馮今源：〈中國伊斯蘭教研究史稿〉，載自《中文伊斯蘭學術城網》，〈<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list.asp?id=2698>〉（2005年9月27日下載）。另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陳廣元編：《新時期阿訇實用手冊》，頁115～116。

<sup>8</sup> 子穆：〈廣州：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承接方式〉，《開遠阿專網》，〈<http://www.kyaz.com/islam/ReadNews.asp?NewsID=443&BigClassName=%E7%A0%94%E7%A9%B6&BigClassID=24&SmallClassID=19&SpecialID=0>〉，（2005年10月19日下載）。

的重臣元老，也有脅迫而來攻打南宋的軍隊。<sup>9</sup> 他們被編入「探馬赤軍」，參加了蒙古貴族征服全中國的戰爭，被派遣到全國各地去駐防和屯守。這些以四海為家的回回人，把伊斯蘭教帶到全國各地。<sup>10</sup>

由於元代穆斯林人數劇增，逐漸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分布特點，這特點可以說是延續至今的。他們大部分聚居在西北，部分移居江南，逐漸遍及華北和雲南。城市裡，他們集中在一、兩條街上；農村裡，他們聚居為一個村落或其中一部分。<sup>11</sup>

### （三）明代海禁造成西移

明朝曾長期實施海禁，規定「片板不得下海」，徹底隔斷穆斯林的海外貿易，失卻與「故國」的聯繫，驟然凸顯陸上絲綢之路，先民開始大量移居西北，其中最典型的是當時南京回族移居甘肅臨潭縣。<sup>12</sup> 相信這也造成了今天穆民多在中國西北的原因。

明代，十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大致形成。他們主要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一個是回、撒拉、保安及東鄉為代表的伊斯蘭信仰體系，以阿拉伯、波斯及其他西域地區遷來的穆斯林，融合當地其他民族而形成的新民族。<sup>13</sup> 以回族為例，由於中外交往與貿易減少，也使穆民日趨穩定，逐漸形成回族，並擁共同宗教信仰，維繫民族心理與感情。東鄉族則以十三世紀從中亞進入甘肅臨夏的蒙古穆斯林為主。保安族稍晚於東鄉族形成，是由東鄉、撒拉及回族等通婚形成的民族。至於撒拉族，則

<sup>9</sup> 同上。

<sup>10</sup> 〈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兩個階段〉，《開遠阿專網》，〈<http://www.chinaembassy.org.sa/chn/zt/zt/t190857.htm>〉（2005年10月30日下載）。

<sup>11</sup> 周燮藩、沙秋真：《伊斯蘭教在中國》，頁81。

<sup>12</sup> 子穆：〈廣州：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承接方式〉。

<sup>13</sup> 楊啟辰、楊華編：《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發展和現狀》（銀川：寧夏人民，1999），頁65～66。

是元代從中亞撒馬爾遷入青海的西突厥烏古斯部撒魯克人分支，與周圍藏、回、漢及蒙等族融合形成的「撒拉回」。<sup>14</sup>

另一個是以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為代表的信仰體系，他們是先有本民族，後才皈依伊斯蘭教。<sup>15</sup>哈薩克族的伊斯蘭化始於八世紀，完成於十二世紀末或十三世紀初。維吾爾族則在十五世紀幾全部改宗伊斯蘭。塔吉克、塔塔爾和柯爾克孜族在十世紀均已信奉伊斯蘭教。最後烏孜別克族則在十七世紀後，陸續進入新疆前信奉伊斯蘭教。<sup>16</sup>

#### （四）清朝時因政治壓迫遷移

有形容清朝乾隆年間後穆民的情況被形容為每況愈下，清朝對穆斯林實行強烈的壓制政策，經常鎮壓穆斯林的反抗遭鎮壓後強制移民，把他們遷移到偏僻落後且易於控制的地區。這種政治背景下，回族承受政治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壓力，為了求得生存的空間，向鄰近藏區發展。<sup>17</sup>

另有保安族在清朝被迫遷移的例子。保安人主要居住在隆務河畔的保安城、下莊和尕撒爾，這三個地方稱為「保安三莊」。大約在清朝咸豐年間（1858至1863年），保安人被迫離開青海同仁保安地方，遷移到甘肅河州大河家地區。保安人遷移的原因有諸多說法，一種主要的說法是同仁封建統治者強制信伊斯蘭教的保安人改信喇嘛教不果，因此強迫遷移。<sup>18</sup>

<sup>14</sup> 周燮藩、沙秋真：《伊斯蘭教在中國》，頁99～100。

<sup>15</sup> 楊啟辰、楊華編：《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發展和現狀》（銀川：寧夏人民，1999），頁65～66。

<sup>16</sup> 周燮藩、沙秋真：《伊斯蘭教在中國》，頁99～100。

<sup>17</sup> 馬曉軍：〈伊斯蘭文化在藏區傳播歷史〉，《共青團蘭州大學委員會網》，〈<http://tuanwei.lzu.edu.cn/docs/yjs/files/newspaper/articles/014-02-01.htm>〉（2005年11月23日下載）。

<sup>18</sup> 〈保安族〉，《中國絲綢之路旅遊網》，〈<http://www.joingansu.com/www2001/minsu/baoanzu.asp>〉（2005年11月23日下載）。

### （五）新中國「運動」的激蕩

195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社會「運動」接踵而至，伊斯蘭教亦難逃被批判之厄運。

1958至1960年中國實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對象是少數民族地區伊斯蘭教、藏傳佛教等宗教制度。學者批評這次改革犯錯不少，如保留太少清真寺及阿訇。<sup>19</sup> 清除宗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對右派分子的鬥爭中，打擊面過廣，傷害了一些宗教界人士。個別地方甚至發生了強迫穆斯林養豬及剃鬍子等傷害穆斯林宗教感情的現象。<sup>20</sup>

文革十年的動亂歲月中，宗教活動陷於停頓，「眾多穆斯林遭受精神摧殘，極大地刺傷了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sup>21</sup> 清真寺也無法幸免，像建於唐朝後期位處杭州，著名的清真寺鳳凰寺，寺中的明代經版要巧妙地塗成土牆，寫上其他文字，才能逃過文革這歷史浩劫並保存至今。<sup>22</sup> 首府北京，除東四清真寺專門開放給外國使館人員做禮拜外，所有清真寺都被關閉。二十多年的「宗教真空」時期，幾代人都失去了接受宗教教育的機會。<sup>23</sup>

---

<sup>19</sup> 「阿訇」是波斯語音譯，舊稱阿衡、阿洪，原為伊斯蘭學者、宗教家和教師之意。中國信伊斯蘭的各少數民族中，也是對具伊斯蘭專業知識者的通稱。維吾爾族穆斯林稱之為「毛拉」。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陳廣元編：《新時期阿訇實用手冊》，頁223。

<sup>20</sup> 陳金龍：〈論1958-1960年中國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942](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942)〉（2005年11月18日下載）。

<sup>21</sup> 周燮藩、沙秋真：《伊斯蘭教在中國》，頁224。

<sup>22</sup> 文刀：〈尋古探幽鳳凰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辦公廳網》，〈<http://www.cppcc.gov.cn/rmzxb/mzzj/200510204876.htm>〉（2005年11月16日下載）。

<sup>23</sup> 周傳斌、馬雪峰：〈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的範式問題探討——以北京回族社區的結構變遷為例〉，《寧夏新聞網》，〈<http://www.nxnews.net/382/2005-7-12/28@94437.htm>〉（2005年10月19日下載）。

補充一點，一如基督教在中國有官方組織管理，伊斯蘭教在中國亦有其組織。1953年5月11日，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在北京成立，中國伊斯蘭教教務指導委員會則於2001年4月23日在北京成立。<sup>24</sup>自1953年中國伊斯蘭教會成立以來，各地先後成立了省(市)、地、縣級伊協近500個。<sup>25</sup>

### 三、中國伊斯蘭教的保教元素

歷經滄桑，伊斯蘭教雖然不像基督教強調積極外傳福音，但仍可以見到穆斯林人數的增長。五十年代初期有500萬人，八十年代初增加至1,400萬，1990年統計為17,597,362人，佔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19.3%。到二十一世紀則增至二千多萬人。<sup>26</sup>其保教元素，主要是因為信仰與生活的緊密聯合。

中國穆斯林要堅守伊斯蘭教的六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使，信經典，信使者，信前定，信後世。信真主，即相信上帝(*Allah*：安拉)存在。他們反對基督教三位一體的教義，認為這有違一神論。信天使；伊

---

<sup>24</sup>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成立的宗旨和任務是：「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發揚伊斯蘭教優良傳統，愛護祖國，團結伊斯蘭教人士和各民族穆斯林群眾積極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與各國穆斯林的友好聯繫和友好往來，維護世界和平，搜集並整理伊斯蘭教史料等。」中國伊斯蘭教教務指導委員會則於2001年4月23日在北京成立。該委員會為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專門委員會，其宗旨和任務是：「在法律和政策範圍內，依據伊斯蘭教經典，對伊斯蘭教教義教規作出權威性的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準確解釋，編寫講經範本，提高伊斯蘭教教職人員水準，規範講經內容，反對利用伊斯蘭教搞宗教極端主義，積極引導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參〈伊斯蘭教〉，《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test/2005-06/23/content\\_8827.htm](http://www.gov.cn/test/2005-06/23/content_8827.htm)〉(2005年10月1日下載)。

<sup>25</sup> 洪長有、王德才：〈明確任務 履行職能——關於充份發揮伊協作用問題的思考〉，《中國穆斯林》第154期(2005年2月)，頁25。

<sup>26</sup> 〈中國伊斯蘭儒家身影〉。90年代數字參胡振華：〈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見《文史知識》編輯部、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宗教研究中心編：《中國伊斯蘭文化》(北京：中華，1996)，頁35。

教把天使分為十大類，各有不同工作；信經典，即古蘭經。他們也贊同摩西的律法書 (*Taurat*)、舊約的詩篇 (*Zabur*) 及印支 (*Indjil*，即福音書)，但認為這些經卷已失去本來面目；信使者，他們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使者，穆罕默德則為最後一位；信前定，即人生一切遭遇，都是安拉命定的；信後世，他們相信末日是審判的日子，使人驚心動魄。<sup>27</sup>

中國穆斯林亦要遵守伊斯蘭教的宗教義務，恪守「天命五功」，在生活中做出來，包括：<sup>28</sup>

- (一) 念誦清真言：要念「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
- (二) 禮：規定每天五個時間向麥加方向禮拜。每週五主麻<sup>29</sup>日下午到清真寺參加聚禮，內容包括禮拜、誦經及講道。禮拜前必須先做淨禮。每年開齋節和古爾邦節也做禮拜。
- (三) 齋：伊斯蘭曆每年九月，凡9歲以上的女性和12歲以上的男性穆斯林，每日從拂曉前至日落之間，禁絕飲食和房事。封齋第29日傍晚如見新月，次日即為開齋節；如不見，則再封一日。<sup>30</sup>
- (四) 課：交納1/40的財產為天課，用來救濟有需要的人。
- (五) 朝：有條件者，一生至少一次去麥加朝覲克爾白天房，在伊斯蘭曆12月10日。凡是去過麥加朝覲的穆斯林，被稱為「哈吉」，冠在他的名字之前，受到其他穆斯林的尊重。

<sup>27</sup> 陳潤棠：《回教與基督教的研究》，第6印（香港：天道，2004），頁49～58。

<sup>28</sup> 〈伊斯蘭在中國〉。

<sup>29</sup> 主麻，即星期五。王正偉：《回族民俗學概論》（銀川：寧夏人民，1999），頁260。

<sup>30</sup> 封齋，為紀念相傳在穆罕默德四十歲那年（伊斯蘭教歷9月），真主傳授《古蘭經》內容給他，故視此月為最尊貴的月份。王正偉：《回族民俗學概論》，頁154。



以上五樣的要求，也保障了即若穆斯林生活在異教的天下，譬如藏傳佛教天下的西藏拉薩，即若他們的飲食、穿戴、住房，甚至語言都與藏族沒有兩樣，但藏區的穆斯林若能嚴格地履行這五條要求，就算虔誠教徒。<sup>31</sup> 若再細看中國穆斯林的生活層面，信仰與生活的牢牢結合，也見諸以下的標誌。

### （一）圍寺而居

清真寺是社區的「靈魂」，是回族人內心世界——一神教信仰的象徵，「它的價值早已超過了任何一種宗教活動場所。對於回回民族，清真寺是自己信仰的支柱，是通向永恆後世的路徑，又是走向現實生活的路標。」<sup>32</sup>

在蘭州市的穆民調查中顯示，在城市改建中，回族居民大多不願外遷離開自己「圍寺而居」的故地，盡可能地要求就地安置居住，實在無法就地安置，就要求到其他回族社區附近居住。近年以蘭州西關清真寺為中心的回族坊的不斷擴大，就足可窺一斑。<sup>33</sup>

圍寺而居其實有點像中國傳統的大家庭，是保存信仰及傳統文化的最佳場所。舉例，穆民不可以喝酒，寺坊內如有一些家庭傷風敗俗或其成員酗酒成風，或違反眾人利益，而這些行徑經勸導沒有「悔過」改正，那麼過節拜年時，就不去這樣的家庭拜年。這樣的家庭在寺坊內很「丟臉」，陷入孤立之境。<sup>34</sup>

<sup>31</sup> 次多：〈拉薩回族的歷史和現狀〉，《中文伊斯蘭學術城網》，〈<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list.asp?id=2799>〉（2005年9月27日下載）。

<sup>32</sup> 引《回族研究》創刊號，甘肅民族研究（1991年），頁82。見楊文炯、張嶸：〈Jamaat：都市中的亞社會族群文化——以蘭州回族穆斯林族群調查為個案〉，《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頁48。

<sup>33</sup> 楊文炯、張嶸：〈Jamaat：都市中的亞社會族群文化〉，頁49。

<sup>34</sup> 哈德江：〈維吾爾族Jamaat群體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0），頁210。

## (二) 內婚制

內婚制也是保教的重要元素。《古蘭經》對穆斯林結婚的條件規定甚詳，<sup>35</sup> 強調結婚雙方須為穆斯林，但男子則可與「有經人」（即基督徒、猶太教徒女子）通婚，女子只能在教內通婚。<sup>36</sup>

民族內婚制度無疑有助穆民人數增長，也是穆民傳統社會結構的重要基礎，阿訇馬松亭曾形容此制度是保障穆民特性的「城堡」，「這個城堡把回教人的特性一直保障了一千年」。<sup>37</sup> 不過，有文章亦指穆斯林的包辦婚姻導致離婚率高。<sup>38</sup>

此外，由於少數民族的生育政策相對寬鬆，故穆斯林平均每年遞增率高達 2.35%，比全國高出 1.27 個百分點，預計 2020 年人口數量可能翻一翻。<sup>39</sup> 生養眾多無疑亦令穆斯林的傳統及信仰得以繁衍。

## (三) 經堂教育

經堂教育指的是以清真寺為中心，傳習伊斯蘭教經典，培養宗教人才的專門教育制度。伊斯蘭經堂教育由明朝嘉靖年間陝西回族穆斯林學者胡登洲倡導，對中原和西北廣大地區的影響甚深。<sup>40</sup>

<sup>35</sup> 《古蘭經》提到「你們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婦女，直到她們信道。已信道的奴婢，的確勝過以物配主的婦女，即使她使你們愛慕她。你們不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以物配主的男人，直到他們信道。」(2:222)，「信道的自由女，和曾受天經的自由女，對於你們都是合法的。」(5:5)

<sup>36</sup> 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委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頁 669。

<sup>37</sup> 周傳斌、馬雪峰：〈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的範式問題探討〉。

<sup>38</sup> 經濟貿易大學馬金指出導致離婚的原因很多，但從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的角度來看，穆斯林人離婚率高是因為外部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與父母包辦婚姻的習俗。因為包辦婚姻被視為父母的「權利」和「義務」，被包辦婚姻的雙方在婚前了解甚少，且年齡較小，感情基礎脆弱，極易離異，而父母不干預子女離異後再婚，從而令雙方獲得再婚的自由。吳小玲：〈可持續發展的大課題——中國穆斯林人口與文化研討會側記〉，《民族團結雜誌網》，〈<http://www.56-china.com.cn/mztj/7/yi3-7M14.htm>〉(2005 年 11 月 18 日下載)。

<sup>39</sup> 同上。

<sup>40</sup>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陳廣元編：《新時期阿訇實用手冊》，頁 117。

經堂教育是中世紀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清真寺內的傳統教育方式，與中國民間私塾教育方式的結合。近代中國穆斯林經堂教育分成小學部和大學部，前者一般三至四年，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大學部則接受系統的宗教和伊斯蘭倫理道德教育，一般學習六到七年。<sup>41</sup>

當然不可忽視的是家庭教育，「大部分穆斯林兒童，他們的生活方式已經完全伊斯蘭化了。可見，穆斯林家庭教育的核心和本質在於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化的傳輸，是伊斯蘭文化傳承的主要途徑之一。」<sup>42</sup>

#### 四、中國城市化與穆民的關係

雖有上述保教因素，但能否抵抗城市化的衝擊呢？

##### （一）改革開放後城市化的速度

關於城市化的水準，現在主要採用的指標是，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sup>43</sup> 根據「2005年中國城市論壇北京峰會」，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城市化逐漸加速，其中1978到1998的二十年間，全國總人口從12.47億增至13億，中國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77%，從17.9%上升到33.35%。1998年至今則進入加速期，城市人口增加了1.2675億，城市化比率從33.35%提高到41.8%。<sup>44</sup>

<sup>41</sup> 張文建：《信主獨一——伊斯蘭教》（北京：世界知識，1999），頁344～346。

<sup>42</sup> 王建斌、李慶元：〈城市邊緣地區伊斯蘭教探微——以蘭州穆斯林社區調查為個案〉，原見《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科版》（2005年2月），《中文伊斯蘭學術城網》，〈<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list.asp?id=3092>〉（2005年9月27日下載）。

<sup>43</sup> 參陳錦華編：《第八個五年計劃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報告》，（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6）。引自武力：〈1978-2000年中國城市化進程研究〉，《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327](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327)〉（2005年11月8日下載）。

<sup>44</sup> 〈城市化率已提至41.8%〉，原載《北京晚報》，2005年9月15日，現刊《中國人口資訊網》，〈[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5598](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5598)〉（2005年10月27日下載）。

然而，西部民族省區的城市化跟不上全國的水準。2000年時，當中國的城市化達36.2%，西北民族省區如新疆、寧夏、青海及甘肅則為28.7%，比東部低17.4%，比全國水準低7.5%。<sup>45</sup>

## （二）人均收入不均導致遷移

城市化程度也與國民人均收入(GDP)息息相關，根據2001年東部地區與民族地區人均收入數字，除新疆外，民族地區各自治區的人均收入均低於全國平均水準。即使是略高於全國水準的新疆(7,913元)，也僅為上海(37,382元)的五分之一。<sup>46</sup>相信這也是穆斯林遷移、特別是他們由農村走進城市的原因。當然亦有其他遷移因素如教育及婚姻等。其中教育因素是維吾爾族、柯爾克孜族和塔吉克族三個民族人口遷移的首要原因，同時也是哈薩克族人口遷移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務工經商是撒拉族人口遷移的首要因素。由婚姻造成的東鄉和保安族人口遷移比例較高。<sup>47</sup>

## （三）穆民遷移情況

向東部及沿海發達城市遷移是人之常情，根據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全國遷移人口共計12,466,252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其中穆斯林遷移的有161,993人，佔穆斯林人口總數的0.8%，稍低於全國的比例。回族則例外，達1.09%，略高於全國的比例。<sup>48</sup>

根據1982、1990及2000年全國穆斯林人口分布的省級行政區資料可見，十個民族所遷移的區數都增加，其中有塔吉克族人口的區數，

---

<sup>45</sup> 高新才、毛生武：〈西北民族省區城鎮化戰略模式選擇與制度創新〉《民族研究》第2期（2002年），頁26～27。

<sup>46</sup>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見龍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加快民族地區發展〉《民族研究》第3期（2003年），頁3。

<sup>47</sup> 孟航：〈中國穆斯林人口分佈格局淺析〉，頁93。

<sup>48</sup> 孟航：〈中國穆斯林人口分佈格局淺析〉，頁90。

更在十八年內多了二十一個，達三十個。<sup>49</sup>按2003年資料，全國共有三十四個省級行政區域。<sup>50</sup>由此亦可見穆斯林人口覆蓋之廣，其中覆蓋率最高的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及撒拉族，已見於全國逾九成，即三十一個省級行政區域。覆蓋率最低的保安族，也分布在近八成的省分中。<sup>51</sup>

另外，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在2005年公佈的資料，更具體地展示穆斯林在各省的人數、清真寺的座數、寺內宗教人士阿訇及海里凡的人數，也可以由伊斯蘭協會成立的年代及數量，勾劃該處與穆斯林的歷史淵源。伊協的數字顯示穆斯林主要分佈在新疆（1,000萬人）、寧夏（193萬人）、甘肅（165萬人）、河南（108萬人）、青海（92萬人）及雲南（63萬人）。<sup>52</sup>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上述提到經濟原因，東部及沿海一帶也有不少穆斯林。其中廣東省雖與穆斯林進入中國的歷史甚有關連，但該省目前主要仍為漢族人口居多；它是改革開放的橋頭堡，這十年間少數民族人口增長246.19%，其中穆斯林也有近三萬人，而該省的伊斯蘭協會卻遲至1998年才成立。而與廣東相鄰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總數最多的區域，然而從1990年至2000年的少數民族人口僅增長3.82%，可見大量少數民族人口湧入沿海地區和經濟發達地區。<sup>53</sup>

接下來看城市化及城市改造衝擊時帶來的三種「遷移者」。

---

<sup>49</sup> 此表乃參1982、1990及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整理，孟航：〈中國穆斯林人口分佈格局淺析〉，頁82。

<sup>50</sup> 截至2004年12月31日，全國共有34個省級行政區域包括23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2個特別行政區。〈中國省級行政區劃變動情況〉，《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29/content\\_2152232.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29/content_2152232.htm)〉（2005年10月27日下載）。

<sup>51</sup> 此表乃參1982、1990及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整理，孟航：〈中國穆斯林人口分佈格局淺析〉，頁82。

<sup>52</sup> 具體資料可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陳廣元編：《新時期阿訇實用手冊》，頁374～391。見附錄1。

<sup>53</sup> 蔣榮：〈少數民族人口：各地分佈今如何？〉《中國民族》總第388期（2003年第9期），頁14。

## 五、城中人——城市改造中的信仰游離者

大城市的伊斯蘭社區，在全國伊教發展中仍居領先地位。<sup>54</sup> 隨著城市化導致城市人口增多，舊城被改造和遷拆，他們置身城市裡相對集中的「小聚居」格局，因而被打破，出現了散居化的趨勢。由於其「遷移」止於一城之中，故名之為「城中人」。他們的城內「遷移」已引起關注，像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上，西北民族大學法學院院長馬玉祥建議，盡快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散居少數民族權益保障法》，以保障三千多萬散居少數民族人口的合法權益。<sup>55</sup>

### （一）中國城市發展與住宅開發進程

內地城市普遍存在居住環境擁擠問題，特別在舊城地區。大規模人口外遷，因而成為改善居住環境的必要措施，<sup>56</sup> 移民所在區域也不例外。

學者將中國城市發展與住宅開發分為五個歷史進程階段，分別是1949年以前的階段一：市中心區呈高密度發展；第二階段則屬1949年到1958或1961年間，隨著快速的都市成長以及戰後的重建，城市住宅乃由國家統籌建設。到1961至1977年間的第三階段，更見城市發展進程與中國當代歷史無法割離，此階段城市擁擠的進一步惡化與十年文革息息相關。至於第四階段是見證中國改革開始的1978年到1988年，隨著城市的開放，城市土地使用漸趨專業化。而第五階段則是1988或

---

<sup>54</sup> 張鴻雁、白友濤：〈大城市回族社區的社會文化功能——南京市七家灣回族社區研究〉，《寧夏新聞網》，〈<http://www.nxnews.net/382/2005-7-12/28@94651.htm>〉（2005年10月19日下載）。

<sup>55</sup> 〈關注兩會：「別忽視了城市少數民族」〉，《回族在線網》，〈<http://www.huizucn.com/show/content.asp?ArticleID=1299>〉（2005年10月19日下載）。

<sup>56</sup> 參魏科：〈人、胡同、四合院、商業改造：北京東成區舊城改造隨想〉，《北京規劃建設》62（1998年），頁47～48。見周志龍、辛晚教：〈台灣都市更新與大陸舊城改造〉《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20期（2001年秋季），頁143。

1989年迄今，我們可以看到隨著舊城改造，舊城人口的外遷，由於單位所得的差異，造成空間的社會隔離，<sup>57</sup> 相信穆民深受其弊。

不容忽略的是，舊城改造與規劃都以賺錢為上，並不在乎民眾利益。學者警告此舉引起的民怨，終將爆發社會抗爭而成為社會隱憂。<sup>58</sup>

## （二）城市化造成「大也分散，小也分散」局面

回族是十族中城市化程度最高者，堪稱「城中人」代表；自穆斯林進入中國後，他們就居住城市、結成地理和文化上的獨立社區等特徵而為人注目。元代以後，雖然大多回族屬農村人口，但他們仍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小數民族群體，例如古都西安、開封、洛陽、南京和北京，都有延續至今的古老回族社區。根據 1990 年人口普查，小數民族的城鎮人口為 1,493.74 萬人，其中以佔 22.56% 的回族最多，達 337 萬人，也佔回族總人口 39%。

然而，城市重建和拆遷的過程中，回族人城市中賴以延續民族傳統的社區也將告消失。例如北京回族聚居的格局已因舊城改造而消失，回族人口進一步分散於全城各個角落。伊斯蘭信仰的淡漠和聚居格局的解體，致使寺坊制的終結。<sup>59</sup> 以北京回族社區牛街地區為例，1997 年牛街拆遷中，學者提到回民與開發公司交涉時，雖然希望最好能夠保持回民聚居狀態，但「民族因素」並沒有「作為問題突出反映出來」，爭執的理由「多集中在家庭內部的矛盾問題、房產的歷史遺留問題上」。<sup>60</sup> 牛街的改造也導致回族人口的流失，只有七成左右回族得到

<sup>57</sup> 參 M. Leaf, "Inner C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City of Beijing," *Cities* 12:3 (1995), 49-162。見周志龍、辛晚教：〈台灣都市更新與大陸舊城改造〉，頁 135。

<sup>58</sup> 周志龍、辛晚教：〈台灣都市更新與大陸舊城改造〉，頁 154。

<sup>59</sup> 周傳斌、馬雪峰：〈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的範式問題探討〉。

<sup>60</sup> 良警宇：〈民族因素在拆遷中的反映〉；引自周傳斌、馬雪峰：〈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的範式問題探討〉。

回遷。北京的馬甸回族社區，同樣，經過多年拆遷，回族由原來大約四百戶，減少到二百多戶。在馬甸新建成的冠城園社區，回族只佔居民總數的2%。<sup>61</sup>

面對城市化帶來的陣痛——「大也分散，小也分散」居住格局的，包括南京市的七家灣。那兒是南京市老市區的中心，在中國伊斯蘭歷史上極具影響力。如明末清初王岱輿等人曾長期在這裏研討伊斯蘭教哲理，闡述伊斯蘭的微言大義。民國期間，這裏曾出版十多種穆斯林的民間期刊，在東部沿海大城市中具一定代表性。然而七家灣圍寺而居的聚居形式正被打破，南京市的現代化建設已經迫使大部分七家灣回民搬離此地，分散到全城各處。這令許多老回民企盼的現代「回民社區」成了泡影，許多回族老人甚至為了留在七家灣，寧與遷往現代化居所的家人分離。<sup>62</sup>

天津紅橋區西北角回族社區，有八至十座清真寺，附近有回族十萬餘人，近年來拆遷改造也使回族人口不斷分散出去。至於天津南大寺周圍是最重要的回族聚居區之一，拆遷改造中有1,800戶回族的住房被拆遷，只有大約300戶獲得回遷的資格，另外1,500戶則被迫離開，需要依附其他回族社區。<sup>63</sup>

至於銀川市，這兒的回族社區發展模式也「由聚居向混居、由封閉向開放、由民族階層向經濟階層的方向發展。」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銀川市回族人口為二十萬人，佔全市總人口的兩成。近年

---

<sup>61</sup> 張鴻雁、白友濤：〈大城市回族社區的社會文化功能〉。

<sup>62</sup> 一位家住絨莊新村的82歲老人在幾年前的政府拆遷中，本來可以獲得70多平方米的套房住宅，但是由於離清真寺較遠而不願去，最後選擇了離清真寺較近、只有30平方米的單室間。另一位1916年出生的老人，女兒的生活條件非常好，多次提出接他過去一起生活，但他都因為女婿是漢民，怕生活不便，故寧孤身一人生活，為草橋清真寺守門。張鴻雁、白友濤：〈大城市回族社區的社會文化功能〉。

<sup>63</sup> 同上。



來，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銀川市傳統的回族聚居模式正解體。如該市興慶區新華街，曾經是市區內一個較大回族社區，古老的新華清真寺坐落在這個社區內，至建國時圍寺而居的回族住戶達百餘戶。但建國後隨著多次城市改造，特別是廿世紀九十年代大規模拆遷後，這裡相繼建立一批商廈，如銀川商城、新華購物中心和商業大世界等，原有的居民區變成最繁華的商業區。曾長期居此的回族大多數遷往北環、德勝、唐徕和光華等幾個住宅區，形成新居民區，由原來的回族聚居變為現在的回漢混居。目前居於東移重建的新華清真寺周圍之回族住戶只有十幾戶，僅佔該街道總人口的 13.6%。<sup>64</sup>

到底城市化，或者城市的改造對「城中人」有何影響呢？

#### 甲、追求物質生活的「城市有害論」

伊斯蘭的年輕阿訇，在座談會上表明「城市有害論」。其中一個阿訇更指出「城市的干擾太多，卡拉 OK 呀，舞廳呀把年輕人都拉了進去。城市在經濟發展上好，在教門上有危害。」在一些大鎮或交通要衝，電視天線已經比比皆是，甚至一些青年已經滿不在乎禮拜、封齋等功課，阿訇也無能為力。特別是蘭州兩家回民加入基督教，聽到消息的阿訇痛心之餘，更建議「很有必要學習基督教的傳播方式，放下爺的架子，確立一種服務者的角色。」也有建議把有限的財力、人力集中到大坊或城鎮，共同培養人才。<sup>65</sup>

---

<sup>64</sup> 馬天龍：〈試論城市化進程中回族的社區變遷及其文化重構——以寧夏銀川市為例〉，《寧夏新聞網》，2005年7月29日，〈中文伊斯蘭學術城〉<http://www.islambook.net/xueshu/list.asp?id=3114>（2005年11月21日下載）。

<sup>65</sup> 馬玉明：〈阿訇是教門的柱子——對於一次談話的印象〉，《伊斯蘭之光網》，<http://www.islam.org.hk/hxmm/zhuzi.asp>（2005年11月21日下載）。

久居老區的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回族老人，最初遷移回區時情感上很難接受，尤其是很多老人都表示「剛搬來時候的確有點寂寞」，但是隨時間流逝，他們的生活方式也開始改變，由原來主要追求精神享受的層面，逐步轉移到追求物質生活的層面。<sup>66</sup>

## 乙、穆民難以保留清真飲食習慣

吃清真食物也是穆民恪守信仰的表徵，禁止吃自死物、血液、豬肉及非誦真主之名而宰的動物。<sup>67</sup>城市化的影響也見諸食物。解放前南京回族社區的飲食業非常蓬勃。七家灣的回族中，幾近八成人都從事與清真飲食服務有關的行業如小吃店、牛羊肉加工和牛羊販運等，此外還有人從事牛羊皮毛的製作。近年回民居住過於分散，清真飲食店的分布亦分散，給清真飲食管理帶來很大不便，甚至出現「清真飲食不清真」的怪現象。<sup>68</sup>

就連北京亦不能幸免。隨著北京加快城市化改造進程，一些老字號清真飲食網點被拆遷選址重建，由於各種原因不獲重建。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陳廣元對此痛心疾首，提出《關於「瑞珍厚」等清真飯莊應予保留的建議》，市委、市政府有關領導都做了重要批示，一批像「瑞珍厚」飯莊的清真飲食生產經營網點才得以保留。<sup>69</sup>

<sup>66</sup> 馬天龍：〈試論城市化進程中回族的社區變遷及其文化重構〉。

<sup>67</sup> 楊啟辰、楊華編：《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發展和現狀》，頁 390。

<sup>68</sup> 張鴻雁、白友濤：〈大城市回族社區的社會文化功能〉。

<sup>69</sup> 何仲：〈乘風破浪會有時 直掛雲帆濟滄海——記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市政協常委陳廣元大阿訇〉，《北京觀察網》，〈<http://www.bjzx.gov.cn/bjgc/BJGCTEXT/200410/20041028.htm>〉（2005 年 10 月 19 日下載）。

### 丙、城中人「搭橋」身分漸次消失

穆斯林素有「天下穆斯林是一家」和「行、賁、居、送、千里不持糧」的觀念和傳統；不容忽視的是，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回族社區原本擔當的角色有點像香港同鄉會，幫助由農村進入城市的穆斯林，可以找到同聲同氣的倚靠。特別是「這在中國全民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健全之前尤其重要。大城市如果沒有回族社區作為穆斯林實現現代化的支撐，鄉村穆斯林就難以跨越城市化的社會『鴻溝』。」<sup>70</sup>

然而，「城中人」分散居住無疑令這幫助鄉村穆斯林跨溝的搭橋身分漸形消失，甚而自顧不暇。銀川市某住宅社區調查顯示，該社區共居住八家回族，長達七年的社區生活中竟毫不相識。調查者坦言感受到散居後，「陌生」對族群認同的威脅。<sup>71</sup>

### 丁、家庭的核心化

對於傳統的回族社區而言，家庭是回族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然而城市化致使個人空間驟減，家庭趨向核心化，這自然不利於保持和傳承傳統文化。

先看西北部城市情況，銀川市的回族核心家庭已佔該族家庭總數的81%，在蘭州則佔67.54%，西安佔68%。<sup>72</sup>較東部及沿海的城市，西北部城市已較保守，面對家庭核心化，那其他城市的變化相信更劇烈。

<sup>70</sup> 張鴻雁、白友濤：〈大城市回族社區的社會文化功能〉。

<sup>71</sup> 楊文炯：〈城市介面下的回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寧夏新聞網》，〈<http://www.nxnews.net/382/2005-5-30/28@88575.htm>〉（2005年10月27日下載）。

<sup>72</sup> 同上。

日益核心化的回族家庭，既沒有數代同堂大家庭的傳統文化氛圍，又沒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良好傳統，小孩因此缺乏潛移默化家庭教育中學習傳統知識的模仿對象，加上家庭教育、社區教育與學校教育在傳統知識方面的割裂，日益核心化的家庭必然對文化傳衍帶來不利影響。<sup>73</sup>

### （三）城市化對城中移民信仰的影響

#### 甲、核心化家庭淡化青年移民信仰

家庭核心化導致青年穆斯林的信仰漸形淡化，不同地方的調查都證實這點。

1996年甘肅省的調查反映了家庭對青年穆斯林的影響。該省有穆斯林156萬人，佔全省人口6.4%，以回族、東鄉及保安為主。有調查以問卷訪問了二百六十位青年穆斯林，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家人中完全恪守伊斯蘭教規者不足六成，僅佔57.1%，遵守部分教規的佔40.9%，已經放棄的約2%。

觀諸青年穆斯林信教的原因，62.7%是精神上的需求，其次是家庭的影響，30.8%受家人影響其信仰。他們自評對信仰十分虔誠的佔31.7%，比較虔誠的居多，達64.7%。51.8%青年穆斯林只是偶爾去清真寺，經常去的只有34.8%。他們去的主要原因是跟隨家人參加。<sup>74</sup>這與不足六成家人完全恪守教規實有相關之處。

調查亦涉及他們眼中伊斯蘭教目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青年人將青年宗教信仰淡化位列第三位(51.7%)，與首兩位的缺乏高質素宗教職業者(55.8%)，及教派間爭權奪利(52.5%)相差無多。青年穆斯林心目

<sup>73</sup> 同上。

<sup>74</sup> 才讓等：〈甘肅省少數民族青年宗教信仰現狀調查〉《宗教》，第4期（2002年），頁112～113。

中的信仰「淡化」指的是不夠虔誠、不經常參加宗教活動、不遵守宗教儀規等。<sup>75</sup>

該區一些老人在座談會中批評青年人對伊斯蘭教的「五功」，不及中老年人堅持得好。許多青年人只了解簡單的宗教知識，不會唸《古蘭經》，不會禮拜，有部分堅持齋戒，許多工作及學習的青年都不封齋，在家時受家人影響才堅持。<sup>76</sup>

雲南省會昆明伊斯蘭文化的中心——順城街回族居民的調查結果，亦證實了青年穆斯林對信仰的淡化。從參加禮拜者的年齡比例有極大差距可見一斑，老年人佔六成以上，中年人佔三成，年輕人僅佔一成左右。調查者認為：「現在的年輕人生長在都市中，不同程度地受到都市文化，尤其是大眾傳媒的影響，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對主流文化的認同超過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sup>77</sup>

## 乙、城中一般穆民的信仰遭城市化所淡化

不只是青年穆斯林，一般城中穆民的信仰亦因城市化而淡化。以東部沿海大城市中具一定代表性的南京七家灣為例，如前所述，明末清初回族先哲王岱輿等人曾長期在這裡研討伊斯蘭教哲理。民國期間，這裡曾出版過十多種穆斯林的民間期刊。像中國回教青年學會、南京回教青年會及中國回教協會總會等近現代回族社團都曾長期在這裡活動。然而，隨著城市化引致拆遷頻繁和大量回族人口遷移，此處已由解放初的七百多戶，至 2003 年剩下一百八十多戶。

---

<sup>75</sup> 才讓等：〈甘肅省少數民族青年宗教信仰現狀調查〉《宗教》第 4 期（2002 年），頁 112～113。

<sup>76</sup> 同上。

<sup>77</sup> 馬壽榮：〈都市民族社區的宗教生活與文化認同——昆明順城街回族社區調查〉，《思想戰線》第 29 卷（2003 年第 4 期），頁 92。

2003年6月在此地的調查顯示，三十三位回民表示信仰伊斯蘭教，佔被訪者的六成；表明已經沒有信仰的回民達十九人，佔總數的34.5%。值得注意的是兩人已經分別皈依了基督教和佛教。這也反映城市化正在動搖傳統信仰的根基。

除七家灣外，南京的調查亦顯示隨著城內改造，回族的居所正向經濟文化最發達的鼓樓區遷移，他們的信仰亦同時淡化。以穆民信仰支柱清真寺的出席率為例，調查指出南京市共有回民七萬左右，週五參加主麻日聚禮的人數基本上保持在三百三十人左右，其中南京本地土生土長的穆斯林不到一半，還不到回民總數的0.5%。從禮拜者年齡來看，五十歲以上的老人佔2/3以上。回民每月去一次清真寺的只有十二人，佔21.8%。至於每年去一次以上的也只有二十三人，佔回民受訪者的41.8%，1/3的受訪回民表示從來沒有去過清真寺，或平均一年也去了一次，從而看見城市化導致南京回族的傳統伊斯蘭教文化淡化。<sup>78</sup>

#### （四）小結

為什麼「城中人」的信仰漸趨淡化呢？

陳進及陳昌文研究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的人口流動問題時指出，同一民族聚居區中流動的宗教信仰人群，其宗教信仰程度將減弱。因為他們處於競爭環境，面對很多新情況、新問題，而很多現象是宗教無法解釋，同時需要更多精力從事經商和務工，所以完成宗教儀式的頻率減少，因而宗教信仰程度減弱。<sup>79</sup>

<sup>78</sup> 張鴻雁、白友濤：〈大城市回族社區的社會文化功能〉。

<sup>79</sup> 陳進、陳昌文：〈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社會流動問題及其前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496](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496)〉（2005年10月30日下載）。

以上指的是同一民族聚居區，然而這說法，是否同樣可以解釋為何世居於城市中、信仰日趨淡化的穆斯林呢？牛街清拆問題中，民族因素並沒有作為問題被反映出來，這多少反映了他們因世居城市而被同化的現象。結果，城中的遷移如同一民族聚居區遷移，需要付出很多精力才能在城中生活得好。「城中人」是否因此無暇顧及信仰呢？

城中穆民信仰淡薄，或許有另外的因素。周傳斌及馬雪峰研究北京回族社區變遷時，看到民族內婚制度難以持守，導致城市中回族社會的消失。他們指出，伊斯蘭信仰的淡漠、教育中缺失伊斯蘭教育內容，居住格局和傳統行業的解體導致回民交往結構的變遷，都使回民難以緊守民族內婚制度，族際通婚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sup>80</sup>

無論如何，值得注意的還是，世居在都市中的年輕穆斯林於世俗化及家庭核心化的影響下，更突顯信仰淡化的問題。有資深牧者及宣教研究人指出，中國回民的外表及語言都與漢人無異，只是傳統生活習慣及身分認同相異而已，漢人確是比較容易接觸及向他們傳福音。<sup>81</sup>更需要注意的是，阿訇亦主張集中精力培養城中穆民人才，向穆民宣教者宜更重視此方面鬆土的契機，積極向城中年輕穆斯林傳福音。

當我們看到這批被城市化，或者說準確點是世俗化影響信仰的城中人，也看到城中的基督徒面對相同的困難。即若年輕穆民改信基督教，同樣會因世俗化而淡薄基督信仰。我們該注意如何牧養基督徒，幫助他們面對世俗化而不被同化，讓信仰與生活真正結合，可以在城市堅守真道，可以改變年輕穆民！

---

<sup>80</sup> 周傳斌、馬雪峰：〈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的範式問題探討〉。

<sup>81</sup> 微聲：〈華人教會與穆宣——我們是理想的接棒人！？〉，《前線差會通訊》第31期（2005年9月）。

## 六、雙城人——帶著知識及資本走向城市的恪守信仰者

「城中人」面對城市改造帶來的遷移以致信仰淡薄，那麼由一個城市走進更先進城市的「雙城人」穆民呢？是否如學者所述「流動到不同的民族聚居區的宗教信仰人群，其信仰程度則增強」？<sup>82</sup>有能力從城市走向更先進的城市者，一般教育水準較高，資本也較豐富。他們看來更能抗衡世俗化的衝擊，更能持守伊斯蘭信仰。

### （一）在商營中貫徹伊教精神

以廣州為例，來這中國南大門的穆斯林大多從事白領職業或商貿活動，具較高文化素質，不然很難在廣州立足。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價值觀體現著穆斯林的人生態度，在與其他都市族群的交往中獲得了認同和肯定。」其中青藏高原南下廣州的青海穆斯林，好幾家上規模、上檔次的穆斯林餐廳都是他們開的。他們恪守不喝酒之教規，也不許在餐館內猜拳，不僅實踐現代企業的經營理念，也把伊斯蘭的精神貫徹到商業營運中。<sup>83</sup>

### （二）眾多知識分子在深圳守齋月

再看更先進的深圳，1979年深圳設市時，只有十多位回族官兵就地轉業，成為最早在深圳市定居下來的穆斯林。到2004年元月穆斯林人數已達四萬多人。<sup>84</sup>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圳三座清真寺中經常作禮拜的八千多人中，其中逾半是知識分子；一年的齋月裡大約有一萬二千多人封齋，其中一半多是知識分子。這在內地清真寺中很少見，「這表明了深圳的穆斯林的民族意識是非常強烈的。」<sup>85</sup>

<sup>82</sup> 陳進、陳昌文：〈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社會流動問題及其前景〉。

<sup>83</sup> 子穆：〈廣州：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承接方式〉。

<sup>84</sup> 楊運鵬：〈深圳穆斯林概述〉，《回族研究》第57期（2005年第1期），頁115。

<sup>85</sup> 根據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整理。楊運鵬：〈深圳穆斯林概述〉，頁118。



### （三）城市的清真寺多見外來者

即若久居城內的穆斯林疏於去清真寺，城中的清真寺也不致門可羅雀，因為有不少外來者。以首都北京為例，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穆斯林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已勇敢地挺進大城市從事商業貿易。他們大多先找城中的清真寺，解決生活問題，然後尋找進一步發展的路徑，是以維族穆斯林已在北京發展出頗具特色的「新疆村」。每到主麻日，除北京牛街禮拜寺外，南京淨覺寺等大城市的清真寺，也能看到維族穆斯林的影蹤。<sup>86</sup>

### （四）政府部門提供便利

利潤至上的城市化發展中，擁有資本者自然較有機會作主，甚而政府也會在宗教方面提供便利。

以溫州為例，為吸引穆斯林在當地從商，民族部門致力幫助外來少數民族解決子女入學、清真飲食等問題。<sup>87</sup>

另一特別例子雖發生在穆斯林外商身上，但多少反映金錢與宗教的關係。曾有外商到安徽省馬鞍山考察以後，決定改為投資南京，原因是馬鞍山當時沒有一個像樣的清真寺，而南京有淨覺寺，禮拜很方便。此事「深深地教育了馬鞍山市的領導」，使他們明白「城市的多元文化其實就是一種文化資本，而城市文化資本運用得好，可以很好地促進地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於是，馬鞍山市政府決定投資二百多萬元，建一個既現代化又具阿拉伯風格的清真寺，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sup>88</sup>

<sup>86</sup> 張鴻雁、白友濤：〈大城市回族社區的社會文化功能〉。

<sup>87</sup> 〈建設「品牌溫州」創新民族工作——中共溫州市委書記李強訪談錄〉，《中國民族網》，〈<http://www.56-china.com.cn/china04-12/05q/zgmz04-5m28.htm>〉（2005年11月21日下載）。

<sup>88</sup> 張鴻雁、白友濤：〈大城市回族社區的社會文化功能〉。另有報導指出馬鞍山市原清真寺屬三級危房，結構不合理，並且面積小，不足一百平方米，給該市回民及國內外信

## （五）恪守信仰背後的原因

上述資料可見，特別是以深圳參與齋戒月者多為知識份子來看，較高文化水準或資本的穆斯林由城市走向更先進城市時，更能持守其信仰。究竟這是因為他們的傳統營商本領，有助其在城中游刃有餘，有助擴闊空間持守其信仰，還是在世俗化的地方，更需要信仰來平衡，洗滌心靈？實地調查中國西北地區穆斯林的研究結果發現，穆斯林可以通過參加經常性的宗教生活來排遣生活中的煩惱，抒發精神鬱悶，保持情感的平衡。<sup>89</sup>然而這是否能套用在更發達的城市生活之穆斯林呢？

2003年研究西部宗教的結果顯示，宗教的虔信程度與現代要素呈反比。宗教虔信程度從城鎮、農區及牧區依次遞減，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居住在更先進城市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其虔誠度比城外及城中人都高，因為「許多進入現代中上層職業的少數民族人物也有較普遍的宗教皈依和依戀現象，這是在交流文化中進行比較所產生的弱勢感進而產生的防禦機制。」<sup>90</sup>

陳進及陳昌文進一步肯定宗教是走入不同民族區域的「相聯繫的紐帶」，他們指出：

---

奉伊斯蘭教客商帶來諸多不便。1999年開始，六屆市政協一直關注清真寺改建工程，多次深入清真寺和回民群眾中調研、視察，並向市政府及有關部門提出「關於盡快啟動市清真寺改建工程的建議」。市政府重視並採納政協建議，先後投資三百萬元改建，但由於前期征地費用太大，工程因資金不足而被迫停工。近年來，七屆市政協又多次視察該項工程的進展，得知該工程後續資金仍無著落，及時向市委、市政府反映，市政府又先後撥付一百四十萬元專項資金進行改建。目前，一座建築面積達二千多平方米、結構新穎別致的清真寺完工。參〈兩屆政協鏗而不捨關注馬鞍山清真寺改建完工〉，《人民網安徽市窗》，〈<http://ah.people.com.cn/GB/channel14/62/200508/15/745.html>〉（2005年11月23日下載）。

<sup>89</sup> 姚學麗、陳昌文：〈試探中國伊斯蘭教的心理慰藉和情感宣洩作用〉，《新疆社會科學》第5期（2004年），頁41。

<sup>90</sup> 陳昌文、李丹：〈西部宗教的行為及其社會樣態〉，《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117](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117)〉，轉載自《中國社會學網》，〈<http://www.sociology.cass.cn>〉（2005年11月18日下載）。

人們在同一民族聚居區往往沒有意識到自己民族屬性，但是當到了不同民族區域時，則強烈地感覺到自己的族屬問題。流動到大城市的少數民族，他們的生活方式開始與大城市愈來愈趨同，他們愈是更加珍視其民族內在傳統和自己的獨特性，而宗教信仰就如同民俗傳統一樣，是區分不同民族的標誌，他們原來素不相識，但是當發現信仰同一宗教時，就相互默認，宗教成為他們相聯繫的紐帶。<sup>91</sup>

## （六）小結

遷移至非民族聚居區、有較高文化水準及資本的穆斯林，似是伊教信仰的忠堅者。這與我們向來以為受教育者相對理性因此易於辨別宗教異同，一旦脫離原居地的宗教規範便較容易接受基督信仰的看法有異。因此，在城市向穆民傳福音時，我們必須注意其遷移年份的長短，方能對症下藥。一旦遇到這些恪守信仰的雙城人，相信需要熟悉伊教的教義與基督教的異同，才有對話的空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互聯網上穆斯林漢文網站已達六十三個，成為城市穆民獲取傳統文化資訊的新管道。<sup>92</sup>到底我們有否把握這個虛擬空間的契機，在其中先觀察，後發言呢？例如《綠色中華——伊斯蘭網站》(<http://www.xaislam.com>)，有三千多人註冊，也連接不少中國伊斯蘭著名網站。

<sup>91</sup> 陳進、陳昌文：〈西部民族宗教地區社會流動問題及其前景〉。

<sup>92</sup> 楊文炯：〈城市介面下的回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 七、城外人之——由農村走進城市者的信仰狀況

如果說高教育水準者走向更先進城市是如魚得水，並能持守伊斯蘭教信仰，那教育水準相對較低又走向城市的「城外人之」，情況又如何呢？

### （一）穆民的教育水準普遍不高

我們先來看穆民的教育水準，除東鄉族外，全國 56 個少數民族中，每百人擁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數比例看，可知其人口素質是相當不錯的。塔塔爾族為 12.94 人，位居全國榜首。烏孜別克族為 9.55 人，這不僅是十個以穆斯林為主的民族中，就是全國範圍而言也非常高。另外，回族為 3.71 人和哈薩克族為 3.7 人也高於全國的水準 3.54 人，而撒拉族（1.43 人）、保安族（1.34 人）和東鄉族（0.32 人）的排名則相對靠後。<sup>93</sup>

文盲人口佔十五歲及十五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及哈薩克族分別只有 1.98%、2.05% 和 2.68%，於全國五十六個民族中名列前三位。而撒拉族、保安族及東鄉族的文盲人口接近或超過本民族人口的一半，差別之明顯無疑令人關注。<sup>94</sup> 這也可見於女性就業的情況上，烏孜別克族和塔塔爾族女性的文化素質較高，就業結構優於穆斯林女性整體水準，排在五十六個民族的前列。東鄉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女性的文化素質較低，就業規模大，卻集中在勞動生產力低的農業部門。<sup>95</sup>

---

<sup>93</sup> 孟航：〈中國穆斯林人口分佈格局淺析〉。

<sup>94</sup> 孟航：〈中國穆斯林人口分佈格局淺析〉。

<sup>95</sup> 吳小玲：〈可持續發展的大課題〉。

不過，仍要注意穆民中以回族人口最多，每一百人只有不夠四人達大專水準，以 2003 年統計資料看，教育水準排名第一之塔塔爾族的人口只有 4,890 人，<sup>96</sup> 以此看來，穆民少數民族的文化水準雖說在國內民族中應屬中等級數，其教育水平卻並不算高。像寫《馬燕日記》而轟動歐洲的馬燕，就是寧夏回族自治州一位失學小女孩。她受外國人關心和幫助才能上學，成為村中第一個女初中生。<sup>97</sup>

## （二）由農村走進近文化城市的穆民

### 甲、走進近文化的東鄉人在蘭州之生活

先來看走進蘭州的東鄉族人，到底走進距離本鄉只有一百來公里的西北大城市，面對怎樣的近文化衝擊呢？

據 1990 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蘭州市有 2,624,353 人，共三十八個民族，漢族約佔總人口的 96.44%，十個穆斯林少數民族都可在這裡找到，共計 82,182 人，佔蘭州市總人口 3.13%，其中回族 79,232 人。相隔短短四年，1994 年抽查蘭州市的回族人口已達九萬餘人。至於外地來此暫住經商、打工的穆斯林，特別是回族、東鄉族和維族等日益增多，據估計約六萬人左右，加上原有的穆斯林人口，目前大約十七萬人，在蘭州形成一個以回族為主的穆斯林民族群體。<sup>98</sup>

<sup>96</sup>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陳廣元編：《新時期阿訇實用手冊》，頁 355。

<sup>97</sup> 馬燕的日記是被法國《解放日報》記者發現，並在報上連載，後被譯成法、英、德及意等多國文字，結果馬燕及當地六十個孩子因外國人的關心而能上學。見 Jamiesun：〈戳穿九年義務教育的謊言〉，《爭鳴》第 337 期（2005 年 11 月），頁 83。

<sup>98</sup> 楊文炯、張嶸：〈Jamaat：都市中的亞社會族群文化——以蘭州回族穆斯林族群調查為個案〉，頁 50。

生活在我國西北地區的東鄉族，從民族聚居區進入近文化的蘭州，相對可以保存其伊斯蘭教文化。改革開放以來，許多東鄉人因經商、工作、婚姻及學習等原因來到這城市。適應城市生活時，他們彼此用言語、宗教及業緣等關係聯繫與合作，逐漸在蘭州小西湖回族聚居地形成鄉源群體，修建自己的清真寺，從而形成相對獨立的聚落。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中，蘭州市的東鄉族人口為1,857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達4,980多人，多了近兩倍。他們主要聚居在七里河區小西湖，有二千多人。<sup>99</sup>

秉承伊斯蘭教圍寺而居的文化，令東鄉族人可以保持其伊斯蘭文化，並有助「形成共同的民族宗教心理。」<sup>100</sup> 語言也是他們互相認可的媒介。東鄉人移居城市後，仍用本族理解的族內話「撒爾塔」<sup>101</sup> 彼此認同，形成有別於他民族的特殊群體。<sup>102</sup>

工作方面，東鄉族人最初來蘭州從事的職業多為餐飲、拆遷、維修、皮革及牛羊肉經營等。這種相對集中的職業範圍迄今也沒有太大改變，致使他們行業間的聯繫變得單純並獨立，加強了內部聯繫，反而與其他民族聯繫的必要性並不強。<sup>103</sup>

## 乙、走進近文化對東鄉人信仰及文化的影響

雖說是一種近文化的遷移，從農村到城市的東鄉人，也要面對文化與信仰行為的改變。其中伊斯蘭教雖主張禁酒，但部分移居蘭州的東鄉

---

<sup>99</sup> 白曉榮：〈東鄉族人移居城市後飲食習俗的傳承與變異——以蘭州市小西湖柏樹巷社區東鄉族聚落為例〉，《中國穆斯林》第153期（2005年1月），頁15。

<sup>100</sup> 同上，頁18。

<sup>101</sup> 東鄉族人自稱為“sart”，源於中亞語。見白曉榮：〈東鄉族人移居城市後飲食習俗的傳承與變異——以蘭州市小西湖柏樹巷社區東鄉族聚落為例〉，頁19。

<sup>102</sup> 同上，頁18。

<sup>103</sup> 同上。

族年輕人飲酒。因為離開了農村原有文化和道德約束的環境，使原有的群體監督機制逐漸消失，世俗的大眾文化影響力漸增。<sup>104</sup>

此外，傳統的男尊女卑觀念亦見改變。女子和男子一樣有自己獨立的職業，不會在家中專門圍著廚房轉，父子用餐時同席，兒媳也和公公、婆婆同席吃飯，待客時主人和客人一起用餐等。<sup>105</sup>另外，東鄉族及保安族的女性就業率甚高，截至1990年已達85%以上，高於穆斯林女性平均73.32%的就業率，也高於全國平均73.02%及漢族女性同期72.75%的水準。<sup>106</sup>

城市化的洪流下，他們要調適自己的宗教生活。如果不能按時做每天的五番禮拜，他們就在閒暇時以彌補的形式去完成，並必須做每週星期五的「聚禮」。<sup>107</sup>

調查發現，除主麻日外，蘭州每個清真寺每天禮拜的人數多在三、四十人至七、八十人之間，一般不超過一百人，且多為中老年人。<sup>108</sup>以1997年蘭州約有逾八萬名穆斯林，有清真寺81座來計算，<sup>109</sup>不足一成人每天參加禮拜。

### （三）走進異文化城市的穆斯林民工

走進城市，連走進近文化者也難逃一變，走進異文化城市的穆斯林民工情況又如何呢？

---

<sup>104</sup> 同上，頁19。

<sup>105</sup> 同上。

<sup>106</sup> 吳小玲：〈可持續發展的大課題〉。

<sup>107</sup> 王建斌、李慶勇：〈城市邊緣地區伊斯蘭教探微〉。

<sup>108</sup> 楊建新等：〈蘭州市城市建設中民族宗教問題及其法制建設研究〉，《宗教》第1期（2000年），頁120～121。

<sup>109</sup> 同上，頁119。

## 甲、很難真正融入城市

據溫家寶在中央政治學習會上所舉出的數字，中國每天有二億農村剩餘勞動力尋找生存及工作的出路。<sup>110</sup> 調查顯示目前已有1億多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工作，但這些農民工很少能真正留下來。<sup>111</sup> 相信其中有不少穆民民工。

農民工很難融入城市生活，南京大學社會學系1998年暑假民工調查，共訪問了388人。四成農民把自己定位為農村人，37%「說不上」自己的身分，另兩成人把自己歸為「半個城裡人」，只有3%說自己是「城裡人」。另外，想留在城中的有44%，不想的31%，說不上的佔兩成。<sup>112</sup>

## 乙、在城市中能保持其傳統文化及信仰嗎？

到底多少穆斯林民工可以保持其傳統文化及信仰呢？從社會學角度看，流動的人口最容易失卻同時又最堅持保留傳統文化。新的環境變化中，他們用新的觀念方式調適其文化。<sup>113</sup> 到底穆民在城市中是失去，還是保留了傳統文化呢？

依理論看，處於少數地位或帶落後文化背景的移民，更可能採取調整自身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途徑，主動或被動地適應遷入區的生活方式因而被同化。<sup>114</sup> 而且，城市社會對傳統人際關係的解構，或者減弱

---

<sup>110</sup> 羅冰：〈中央文件披露社會「定時炸彈」〉，《動向》第242期（2005年10月），頁9。

<sup>111</sup> 〈農民工返鄉只能使中國「城市化」徒有其表〉，《中國人口資訊網》，〈[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5753](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5753)〉（2005年10月27日下載）。

<sup>112</sup> 朱力：〈農民工階層的城市適應〉，周曉虹主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4），頁598。

<sup>113</sup> 白曉榮：〈東鄉族人移居城市後 飲食習俗的傳承與變異〉，頁19。

<sup>114</sup> 楊雲彥：〈中國人口遷移與城市化問題研究〉，《中國人口資訊網》，〈[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108](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108)〉（2005年10月27日下載）。



人際關係依附，皆有利於非規範觀念或信仰植入。<sup>115</sup> 這雖然不適用於教育水準較高、資本較豐、遷入城市的穆民，但穆斯林民工呢？如果他們的信仰根基根本不穩，就如上述所說的宗教虔信程度從城鎮、農區及牧區依次遞減，<sup>116</sup> 那他們是否根本無法像許多進入現代中上層職業的少數民族人物那樣皈依和依戀宗教呢？

進入城市生活的鄉民，可能仍然自覺地利用原有的傳統網絡如血緣、地緣和姻親等，及新建立的關係網絡如朋友和信仰，謀求最大利益。<sup>117</sup> 像身居城市的東鄉族人，也為農村親屬在城裡尋找工作或提供食宿。<sup>118</sup> 但如上文所述，他們的親友——久居城市者在信仰中最受城市化影響而改變，自身難保。那麼這群走入異文化，且普遍教育水準低落者的聚焦點應是生計問題。進城的民工大都是出賣簡單勞動力的藍領勞動者，做的是城市人不願從事的行業和工種，收入低下，工作不固定，<sup>119</sup> 他們是否還有空間與精力保教呢？

目前比較缺乏關於穆斯林民工的信仰進入異文化後有何改變的研究，<sup>120</sup>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絕對不像帶資本走入城市、恪守信仰的雙城人，也不像久居城中被城市世俗化改變得厲害的城中人。其信奉伊教的程度，應該處於二者之間。若再分得仔細些，該傾向後者。

---

<sup>115</sup> 梅璧珠摘錄：〈黃劍波：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基督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第38期（2005年10月），頁13～14。

<sup>116</sup> 陳昌文、李丹：〈西部宗教的行為及其社會樣態〉。

<sup>117</sup> 梅璧珠摘錄：〈黃劍波：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基督教〉。

<sup>118</sup> 廖楊：〈東鄉族宗法文化論〉，《民族研究》第4期（2002年），頁46。

<sup>119</sup> 〈農民工返鄉只能使中國「城市化」徒有其表〉，《中國人口資訊網》。

<sup>120</sup> 零星的資料如提到廣州政府要重視宗教問題，因為「隨著廣州的經濟發展，大量外地民工湧入，尤其是從新疆、甘肅等地區來的少數民族民工，集居在廣州各區，情況複雜，給管理者帶來新問題。」到底「情況複雜」指的是什麼卻不見闡釋。見〈重要會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網》，〈<http://www.gzzx.gov.cn/meet/meetjianbaodetail.jsp?meetjianbaoid=56>〉（2005年11月17日下載）。

#### (四) 其他：一個農村突然城市化的極端例子

在此一提銀川突然城市化的例子，有助我們了解農民面對城市化的戲劇性改變。

建設大銀川中，因徵地而失去土地的原銀川城郊農民有三萬多人，其中回族人口佔21.4%。這些失去土地的回族農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得到少則二十至三十萬元多達數百萬元的土地補償金後，除了購買一定數額的各類社會保險外，還把大量資金閒置在銀行裡，或者以高利貸形式發放給做生意的人（傳統的回族社會裡，這種行為由於受教規限制而很少發生），自己似乎成了「城市中的無產階級」，在街頭或家中常常打麻將「過過手癮」，或「拿起革命的酒杯解解饞」，這似乎成為「一夜暴富」起來居民的時尚。<sup>121</sup>

#### (五) 小結

總結而言，移民由農村走進近文化的城市，在信仰及生活上要面對的衝擊較小，故改變信仰的機會相比比走進異文化的移民也小。因為走進異文化的震撼，改變其素與信仰結合的生活。

無論如何，走進近文化與異文化城市的移民都是我們的福音對象。面向這些教育水準不高的「城外入」，傳福音時該注重如何立體地傳講。正如有學者指出，異夢和異象是世界各地穆斯林歸信基督教的一個主要因素。他收集了六百五十多宗穆斯林歸信的見證，其中三分之一提到異夢及異象，相信這些異夢及異象都是立體傳福音的例當然我們也要注意「我們盡可談及這些神蹟奇事，但不能取代基督指示使徒傳福音的方式。換言之，福音是要藉人去傳揚，得夢及經歷神蹟奇事的人，最後仍需要人。」<sup>122</sup>

<sup>121</sup> 馬天龍：〈試論城市化進程中回族的社區變遷及其文化重構〉。

<sup>122</sup> 〈穆宣之門漸開〉，《大使命中心網》，〈[http://www.gcciusa.org/b5/eBooks/Muslim&Today/b5\\_Muslim&Today05-2.html](http://www.gcciusa.org/b5/eBooks/Muslim&Today/b5_Muslim&Today05-2.html)〉（2005年11月22日）。穆宣宣教士帕謝也有記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這班相對處弱勢的「城外人士」來說，基督徒往往會透過社會服務予以關懷。不過，有國外批評指，這是利用當地人窮困的處境，誘使他們改變信仰。<sup>123</sup> 為避免這些批評，我認為資深穆宣者帕謝 (Phil Parshall) 的建議值得參考。他認為差會一方面派遣受訓人員來傳福音，同時設立一個平行而獨立的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成員要受過醫療、教育及兒童護理等工作訓練，以基督徒的名義作工，但並不會有明顯的傳福音活動。帕謝指出這兩個小組可以攜手進行全人關懷的工作。<sup>124</sup> 這是建議在外國使用的方法，套諸中國城市中，到底是否可行？我想有機會的話，可以向身處內地的穆宣者請教。

## 八、結語

回顧十個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歷史，發現他們曾經是信奉景教的基督徒。既有往蹟，重新歸正是否亦非天方夜譚呢？<sup>125</sup> 我十分認同陳潤棠所說：「我們應先破除一個老成見：就是認為引導回教徒信主是不可能的，是十二萬分困難的。」<sup>126</sup>

---

錄穆斯林因異夢而信主，他引述米勒的記載，提及一名穆斯林曾在夢中見到一座其大無比的宮殿，殿頂上放著一個十字架。有一把聲音告訴他，那是屬於耶穌的宮殿，而只有祂才能開啟大門。後來他閱讀《天路歷程》，看見一幅與他夢中所見完全一樣的圖畫，大吃一驚，因而信主。引自William McElwee Miller, *Ten Muslims Meet Christ*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69), 79；見帕謝著，翻譯小組譯：《勇闖新天地——嶄新的處境化事奉模式》（香港：宣道，2000），頁93。

<sup>123</sup> "The Mosque Should Be Used as the Centre of Community Service," *Dainik Bangla*, 1 August 1977, 1；見帕謝：《勇闖新天地》，頁128。

<sup>124</sup> 帕謝：《勇闖新天地》，頁131～132。

<sup>125</sup> 以維族為例，十二世紀全族數百萬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兒現在已經有維吾爾文字的聖經，傳言近年一些維吾爾族因經歷醫病和神蹟奇事而信主，有非公開的維吾爾族基督徒團契。鄰近的哈薩克斯坦有數百個維吾爾族基督徒。有針對維吾爾族的遠東福音廣播。〈伊斯蘭在中國〉，《伊斯蘭，基督教，真理網》，〈[http://answering-islam.org.uk/Chinese/project/big5\\_index.htm](http://answering-islam.org.uk/Chinese/project/big5_index.htm)〉（2005年9月28日下載）。

<sup>126</sup> 陳潤棠：《回教與基督教的研究》，頁171。

陳氏在述及向穆斯林傳福音的方法時，提到我們必須到他們當中，住在其中，用基督服侍人的精神辦醫院，開學校。<sup>127</sup> 若再重看走進城市或在城市中游離的穆民，我們發現在城市化的洪流中，各有各的文化與信仰衝擊。而我所列出的三類人，其實不過是概括。我想，最理想的宣教方法還是走進他們當中，觀察、了解每一個獨特的生命故事，然後對症下藥，宣揚基督的福音。

需要補充的是，伊斯蘭很著重形式，很重視表面的敬虔行為。雖然我們不強調以行為得救，但也必須行為檢點，所以我也認同穆斯林所主張的「一個聖潔的人應該擁有簡樸的生活，亦會渴望在世俗和物質上得到富足。」<sup>128</sup>，盼共勉之！

---

<sup>127</sup> 同上，頁 175。

<sup>128</sup> 帕謝：《勇闖新天地》，頁 110。

附錄一：中國各地伊斯蘭教概況<sup>129</sup>

地方	協會成立日期	穆斯林 (萬人)	在寺阿訇 人數	在寺海里 凡 <sup>130</sup> 人數	清真寺 座數	縣級(縣、區)市 伊協數量/ 地市級伊協數量
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	1956年10月	1,000	29,000	1,289	23,000	63/14
寧夏回族 自治區	1959年2月	193	5,328	8,000	3,500	11/4
甘肅省	1957年12月	165	3,853	9,166	3,199	36/6
河南省	1981年6月	108.32	1,017	1,600	929	70/18
青海省	1981年	92	2,280	3,500	1,356	7/4
雲南省	1984年8月	63	2,000	5,000	791	16/6
山東省	1954年9月	60	760	543	416	24/13
河北省	1956年9月	57.3275	618	662	426	11/8
安徽省	1981年8月	40	18	70	161	4/6
遼寧省	1963年	27	120	160	118	0/13
新疆生產建設 兵團民族宗教 事務委員會	—	26	450	28	432	—
北京市	1979年12月	25	140	20	70	10/0
內蒙古自治區	1982年	23	271	339	176	4/5
天津市	1981年6月	18	110	128	58	8/0
貴州省	1983年4月	17	608	620	144	1/2
黑龍江省	1964年	16	116	37	108	2/7
湖南省	1985年5月	15.124	46	93	60	9/8
陝西省	1983年12月	15.0312	105	220	105	7/5
山西省	1990年3月	15	513	562	106	9/3
江蘇省	1980年12月	13.5	67	5	48	12/10
吉林省	1981年8月	13.3	98	57	84	2/6
四川省	1982年12月	11.2478	200	60	122	8/8

<sup>129</sup> 此表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陳廣元編：《新時期阿訇實用手冊》，頁374～391。

<sup>130</sup> 「海里凡」，阿拉伯語音譯，原意為「代理人」，中國內地穆斯林一般用以稱呼在清真寺裡學習宗教知識，力求達到「阿訇」水平的學生，或稱「滿拉」。參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委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頁206。

(續) 中國各地伊斯蘭教概況

地方	協會成立日期	穆斯林 (萬人)	在寺阿訇 人數	在寺海里 凡人數	清真寺 座數	縣級(縣、區)市 伊協數量/ 地市級伊協數量
湖北省	1984年5月	7.9438	70	5	58	3/2
福建省	1983年9月	9.5	6	1	5	2/3
上海市	1962年8月	5.9352	16	20	7	—
廣西省	1987年10月	3	28	50	21	2/3
廣東省	1998年7月	2.877	8	4	8	0/4
江西省	2002年10月	1.15	4	3	5	0/3
重慶市	1984年1月	1	8	20	8	1/0
浙江省(待建) 杭州市	1980年6月	0.741	7	8	4	0/4
海南省三亞市	1994年	0.6	30	0	6	—
西藏自治區 拉薩市	1985年	0.3	6	0	4	—
合計	—	2,046.898	47,901	32,270	35,535	322/169

## 撮 要

中國城市化對兩千萬少數民族穆斯林在信仰上有何影響呢？筆者嘗試將受「遷移」影響者分為三類，並希望在宣教上能對症下藥：

城中人：因城市規劃而被迫在同一個城市中遷徙者。研究發現世居在都市中的年輕穆斯林，在世俗化以及家庭核心化的影響下，他們的信仰漸形淡化，成了最佳的傳福音對象。

雙城人：帶著資本或知識，從一個城市走進更先進的城市者。他們看來是伊教信仰的忠堅者。這與我們向來以為他們一旦脫離了原居地的宗教規範，會較容易接受基督信仰的看法有異。一旦遇到這些恪守信仰的雙城人，相信也需要熟悉伊教的教義，與基督教的異同，才有對話的空間。

城外入：因生計從農村走進城市者。筆者將之分為兩類，走入近文化及相對的異文化。前者面對的衝擊較小，故改變信仰的機會比走進異文化的移民小些。他們絕大部分的教育水平不高，傳福音時該注重如何立體地傳講。

## ABSTRACT

What has urbanization done to the twenty thousand Muslims in China?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mobile Muslims in terms of three categories, and thus shedding light on how Christians can preach the gospel of Christ to this particular group effectively.

The first group refers to those who are forced to disperse within a city because of the city planning.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se young Muslims a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cular values as well as nuclear family setting, which affects the belief of the young Muslims. Thus they will become the target group to be evangelized.

The second group means those who move from one city to another with their capital and knowledge. They are regarded as the faithful Muslims. The situation is rather different from what we have presupposed that they are more ready to accept Christianity once they are away from home with strong religious ties. Christians should grasp the doctrines of Islam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n order to open a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s and Muslims.

There are two groups of people who move from villages to cities because of earning a living. The first group lives under the near-culture while the second group resides in a

quite different culture from their own. The first type of city residents face relatively little challenges. Thus, they are not very likely to change their belief compared to those in the second group. Most of the Muslims in the first group are not educated, that is why we need to present the Bible messages to them in a more lateral way.